史记文献研究集刊之三

史记研究资料萃编

下册

张新科 高益荣 高一农 主编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史记文献研究集刊之三

史记研究资料萃编

下册

张新科 高益荣 高一农 主编

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研究资料萃编/张新科 高益荣 高一农编. —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8

ISBN 978-7-80736-876-2

Ⅰ.①史… Ⅱ.①张… ②高… ③高… Ⅲ.①史记-研究资料-汇编 Ⅳ.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3528 号

史记研究资料萃编

张新科 高益荣 高一农 主编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商标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55.75
字　　数 10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36-876-2
定　　价 158.00 元

网　　址 WWW.sqcbs.com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工作委员会

顾问 霍松林

主任 李西建 张新科

委员 邢向东 赵望秦 霍有明 刘锋焘 赵学勇
李继凯 尤西林

《长安文献资料丛书》编委会

顾问 霍松林

主编 赵望秦 张新科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冯文楼 刘生良 张新科 赵望秦 党怀兴 周淑萍
高一农 高益荣 魏耕原

《史记文献研究集刊》之三

策划 赵望秦 张新科

撰稿（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 倩 马雅琴 王纪刚 安玉玲 刘莉莉
池万兴 孙文阁 宋锡玲 张 华 张 强
张文安 张新科 赵国玺 俞樟华 段章平
高一农 高晓庆 高益荣 雷苓玲 鲍海波

三、《史记》各篇研究

0137【本纪总论】

1. 刘知几认为，“迁之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斯诚谠矣。但区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后之学者罕详其义。案：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襄，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若以西伯、庄襄以上，别作周、秦世家，持殷纣以对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传授，昭然有别，岂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简约，别加一目，不足成篇。则伯翳之至庄襄，其书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辄与本纪同编，此尤可怪也。”（见《史通》卷二《本纪》）

2. 欧阳修认为，司马迁所作本纪，出于《大戴礼》、《世本》诸书。“以孔子之学，上述前世止于尧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迁远出孔子之后，而乃上述黄帝以来，又详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务胜，宜其失之多也。迁所作本纪出于《大戴礼》、《世本》诸书。今依其说图而考之，尧、舜、夏、商、周皆同出于黄帝，尧之崩也，下传其四世孙舜，舜之崩也，复上传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寿百岁。稷、契于高辛为子，乃同父异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汤与王季同世，汤下传十六世而为纣，王季下传一世为文王，二世而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孙纣，何其缪哉！”（见《欧阳文忠全集》卷四三《帝王世次图序》）

3. 晏世澍认为，“太史公著《史记》，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他引用《索隐》、《史通》等证其论。“《索隐》曰，本其事而纪之，故曰本纪，若是则凡纪人事，皆可通称，不已泛乎？《史通》则曰，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以上显国统，诚确论也。又曰，统者，编年；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盖言用其纪元纪时事也。本纪之目，发凡起例，创自史迁，后世因之，守而勿失。然迁亦何所本以成此例哉？或曰，古有《禹本纪》、《尚书》、《世纪》等书，迁书用其体以叙述帝王。或曰，本纪书法，全本《尚书》。如《高祖本纪》，先总叙高祖一段，及述其初起事，则称刘季，得沛后称沛公，王汉后称汉王，即帝位则称上，其法本于《舜典》，未即位以前称舜，即位之后分命九官即称帝曰，古时虽朴略，而史笔谨严如此。又《顾命》康王未即位称子钊，即位后即称王，亦此例也。如此诸说，颇亦有见。然本纪之所规仿，其必有所自来者矣。”晏氏接着批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了一些认为收项羽入本纪是乱例的说法。“夫迁之取例诚如此，然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襄，诸侯也，而亦以本纪名之，项羽名曰西楚，号止霸王，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而亦称本纪，自乱其例，曾为后儒所讥。夫自例无可辞，而取式何必太拘，迁亦法其以月纪事之义而已矣。”（见《沅湘通艺录》卷二《太史公本纪取式吕览辨》）

4. 朱东润认为，后人议论本纪的理由不足为证。“本纪之滋后人议论者三焉：秦自庄襄以上不为世家而为《秦本纪》，一也；《项羽本纪》二也；《吕后本纪》三也；至于《孝武本纪》之出于伪窜，无足讥焉。今按《自序》云‘略推三代，录秦汉’，自不得不详秦之先世。《秦本纪》云，‘秦之先伯翳，帝颛顼之苗裔’；《秦始皇本纪·赞》云，‘秦之先伯翳，尝有勋于唐虞之际’；此言秦之由来远也”。“况诸侯史记，中经放绝，独《秦纪》仅存，为之纲领，又安得而不为本纪乎？此其一。项羽自为西楚霸王，霸者伯之借字，伯长也，羽既为诸侯长矣，故《本纪·赞》曰，‘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则史迁又安得而不为立本纪哉？此其二。惠帝为天子七年，而不立本纪，自班固始，已不能安，故《汉书》先立《惠帝纪》，帝崩始立《高后纪》，因以帝纪为名，例本当尔，然而《史记》不以帝纪为名也。孝惠元年感人彘事，使人谢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史迁既明著其辞，又曰：‘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自元年始，孝惠不能听政，纲纪天下者舍吕后而谁？史迁又安得而不本纪之者？此其三。”（见《史记考索》第10～1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 党丕经认为，“‘十二本纪’的编撰，第一次使中华民族历史以‘通’的形态表现，在史学领域表现了中华民族这一巨大的时空实体的统一，完成了从原始部落中经长期诸侯纷争而终于实现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上起轩辕，下至于兹’；中华民族从此有了自己完整的民族谱系。曾经是零乱的、分裂的、充满矛盾斗争的部落部族、诸侯分争的历史，在《史记》中奇迹般地呈现为有机整体的，发展线索清楚的历史。”“读‘本纪’，可把握两千多年古史之轮廓，可知两千多年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可观王朝之兴替及其原因，可察各代帝王之作为。”（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增刊《论〈史记〉的史学框架》）

6. 杨燕起认为，“司马迁创设本纪这一体裁，是将‘上起轩辕，下至于兹’的时期，当作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待的。他着意于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从‘通古今之变’的角度探求社会历史的总体盛衰变化。并以此为

纲，指导他在其他体裁中进行关于社会典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具体记述。在这个设计中，司马迁所说的‘王迹所兴’，体现在《史记》本纪的记述中，则是表现了他所要记述的是时势主宰者的事迹，以此体现出本纪所具有纲纪天下政事的重要意义”，“从史学研究的整体来估计，笔者认为从记述时势主宰者的角度阐释《史记》的本纪，较之只是讲‘天子曰本纪’的提法，更能体现出司马迁史学思想的进步性。而从这个角度进行阐释的命题的出现，正是对一些传统提法不断反思并逐渐深化所形成的。这本身正好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步伐，恰恰表现出历史研究的某种时代气息，时代特征。”（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增刊《关于史记的本纪》）

0138【五帝本纪】

1. 苏辙谈论到司马迁称五帝而不列少典的原因，他认为，“孔子删《诗》及《书》，起于尧舜稷契之际，以为自是以上其事不可详矣。至司马迁纪五帝，首黄帝，遗牺农而黜少昊，以为帝皇皆出于黄帝，盖纪其世，非纪其事也，故余因之。然黄帝本神农之后，少典之子，神农岂非五帝世耶？盖黄帝、高阳、高辛，子孙有天下，而少典之后不传，《周礼》六乐无少昊之乐，《易》叙古帝王，亦不道也。迁由是黜而不纪，后世多以迁为非者，于是作《三皇本纪》，复纪少昊于五帝首。”（《古史》卷一）

2. 胡寅认为，五帝应为羲、农、黄帝、尧、舜。他说：“昔司马迁作本纪，列黄帝、颛、辛、尧、舜五人焉，其言曰：孔子所告宰予，儒者或不传，及《春秋》、《国语》发明《五德》、《系姓》章矣，书缺有间，乃时见于他说。善乎予弟宏之论曰：判古昔之昏昏，当折衷于仲尼。仲尼系《易》，历叙制器致用兼济生民者，独称羲、农、黄帝、尧、舜氏，盖以是为五帝也，而颛、辛无闻焉。太史公载特形容之虚语尔，乌得与羲农比也！岂迁有见于《尚书》之断自唐尧，而无见《易》之称包牺欤？故凡论道事，一折衷于仲尼则无失者。置仲尼而取儒者所不传及它说为据，未有能臻其当也。”（见《斐然集》卷二十一）

3. 罗泌认为，“司马氏父子世典太史，其作《史记》也，首于黄帝，而继之颛帝、帝喾，又继之以唐、虞。以为纪三皇邪？则不及羲、炎；以为纪五帝耶？则不应黜少昊而首黄帝。学者求之而不得其说，此所以致后世之纷纷，而苏子之所以三皇也。窃观《太史公记》首黄帝者，特因于《世本》若《大戴礼·帝系·五帝德》，盖纪其世而非主于三与五之说也；抑以为后世氏姓无不出黄帝者，故首而宗之。至于羲、炎鲜有闻焉，是以不纪，此太史公之本意也。”（见《路史发挥》卷三

《论史不纪少昊》）

4. 范浚认为，“孔子定书，断自唐虞以下，以为唐虞以上不可知也。圣人去古未远，犹难言之，太史公乃欲为黄帝、颛顼作纪于千百岁后何耶？世传《孔子家语》载《五帝德》、《帝系姓》等，皆非古书，使其说诚详如之，则夫子著之于《书》久矣。意迁姑欲捃摭传纪以示洽博，非复考其言之当否。夫黄帝，神农后也，阪泉之战，信亦悖妄，以臣伐君犹有惭德，而况为之后者！信或有之，则黄帝贼矣，尚得为圣人乎？”（见《香溪集》卷十九《五帝纪辩》）

5. 叶适认为，“羲、黄为文字之始，圣智之先，不独学者言之，孔子盖言之矣。至于简弃鸿荒，断至尧、舜，则何必孔子？自舜、禹以来固然也。何以知之？方禹、益、皋陶共明治道，祖述旧闻，其时去黄帝、颛顼不远，所称道德广大，皆独曰尧、舜，未有上及其先者，推群圣贤之心，岂夸祢而轻祖哉？故余以为神灵不常，非人道之始，缺而不论，非掩之也。如迁所见《五帝德》、《帝系姓》，虽曰起至黄帝，若夫稽古而陈之，君止尧舜，臣止禹、皋陶，而羲、农后、牧之伦不预焉，迁未造古人之深旨，特于百家杂乱之中，取其雅驯者而著之，然则典谟大训徒雅而已乎！况黄帝、尧、舜之治，既数千年，长老所言不可信，审矣。不择义而务广意，亦为学之患也。孔子谓颜渊：‘行夏之时，乘殷之路，服周之冕。’盖为邦之要略，汉儒之智，未足以及此也。而迁纪夏商，言‘孔子正夏时’，又曰‘殷路车为善’，近是矣；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矣’，则迁不能知，故曰‘受命称王，改法度，制正朔’。当以孔子为正也。”（见《习学纪言》卷十九）

6. 黄震认为，“迁之纪五帝，自谓择言之尤雅者著于篇，其存古之意厚矣，然黄帝杀蚩尤与以云纪官，才一二事，若封禅事已不经，至颛顼、帝喾纪，皆称颂语，非有行事可考。唐虞事虽颇详，皆不过二典所记载。然则孔子定书，断自唐虞，至矣，何求加为？”（见《黄氏日钞》卷四十六《史记》）

7. 柯维骐认为，“五帝之名，见于《孔子家语》及《大戴礼》，其说有二：其一，孔子答季康子，以伏牺配木，神农配火，黄帝配土，少昊配金，颛顼配水，此言数圣人革命改号，取法于五行之帝，非五帝之定名也；其二，则孔子所答宰予五帝德，曰黄帝，曰颛顼，曰帝喾，曰尧，曰舜，太史公所述《五帝纪》是也。厥后，皇甫谧作《帝王代纪》，苏子由作《古史》，郑樵作《通志》，并祖孔安国，以伏牺，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五峰双湖胡氏又主

秦博士天皇、地皇、人皇之仪，而以伏牺、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道原刘氏遂以为定论。窃谓皆不如太史公之说为有征耳。”（见《史记考要》卷一）

8. 郝敬指出了《五帝本纪》的疏漏之处，他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礼记》云：虞氏禘黄帝、郊喾、祖颛顼、宗尧。《世本》谓尧为黄帝曾孙，舜为黄帝八代孙。果尔，尧二女与舜曾祖为四从兄弟，岂可以妻舜？禹父曰鲧，鲧父曰帝颛顼，禹者黄帝玄孙，帝颛顼之曾孙也，岂黄帝至禹才四代，至舜反八代乎？《本纪》于此曾无一语驳正。至班固《律历志》又谓禹父鲧，为颛顼五世孙，总之传疑。而迁史尤愦愦，疏略抵牾，勿怪乎班氏讥之也。”（见《史汉愚按》卷一）

9. 陈仁锡认为，《五帝本纪》可称为史中之经，他说：“《五帝纪》有谓非太史公极笔者，以少跌宕处耳，正惟无跌宕，乃太史公极用意之文，其叙次征诛，揖让、朝觐、会同，圣人经世大典，严整慎重，一切齐谐怪语之书，不能轻入，所以为史中之经，而高古质邃尤为可喜。”（见《陈评史记》卷一）

10. 黄淳耀认为，“太史公《五帝纪·赞》以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又历叙己所采于长老及《春秋》、《国语》与他说之足以参古文者而成是篇，则凡骑龙铸鼎诸诡异事，乃太史公所谓不雅驯弃如涕唾者也。今人乃掇其弃余而津津艳称之，何哉？又太史公史赞皆有超识，司马贞妄讥之，以为不能备论，遂别为《述赞》概括通篇，每人置评，事虽不遗，意见则猥陋矣。”（见《史记论略·五帝本纪》）

11. 张大可先生认为，《史记》开卷起自黄帝，寓意于颂扬大一统。他说：“上起黄帝，理由有四：第一，司马迁在全国游历考察中，‘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各地尽管风教不同，但长老口碑相传的黄帝事迹非常生动；第二，《五帝德》、《帝系姓》司马迁认为是孔子所传典籍，经与《春秋》、《国语》参证，认为是可靠的资料；第三，谱牒资料，《百家》言黄帝，虽然其文不雅，但绝非无因；第四，‘书缺有间，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综合上述考察，司马迁认为《史记》上限应起于黄帝，以《五帝德》、《帝系姓》为根据，对《百家》之言，长老口碑，择其言雅训者记焉，对于不可信的资料则屏而不录。所以对黄帝以来的年数就不加记载，而只作《三代世表》，仅仅谱列一个从黄帝以来的粗略世系以象征历史发展的线索而已。那末，司马迁为什么只延伸上限至黄帝而止呢？因轩辕氏‘修德振兵’统一了天下。《史记》开卷起自黄帝，寓意于颂扬大一统。《史记》所载三代天子，列国世家，忠臣义士，追祖溯源，皆归本于黄帝，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这一观念就奠基于《史记》。《史记索隐》作者司马贞不明此旨，越俎代庖替

《史记》补《三皇本纪》，可谓画蛇添足。”（见《史记全本新注·五帝本纪》后的“简论”，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12. 钱钟书认为，《五帝本纪》的“寓规”之旨早发于李邺嗣《杲堂文钞》。“周广业《蓬庐文钞》卷二《〈史记〉首黄帝说》略云：‘《史记》之首黄帝，非其本意，观《五帝本纪·论》及《自序》，再参之《封禅书》，可以知之。一再称‘尧以来’，‘陶唐以来’，明乎删《书》断自唐虞，前此宜置勿论。然汉自高帝起，有祠黄帝于沛庭；《外戚世家》言窦太后好黄老；孝景武帝皆读其书，武帝用李少君说至有‘吾诚得如黄帝，视妻子如脱躧’之叹；《封禅书》所载巡狩、改历诸事，无一不托诸黄帝；公孙卿‘黄帝且战且学仙’一语，尤足为武帝穷极兵力之缘饰。盖当代天子祖述宪章之帝也。太史公之父自恨不得从封太山；作史之年适当太初元年明堂改建、诸神从祀之时，正用黄帝迎日推筴法。不首黄帝，失臣子将顺之道，然而寓规于颂，文微义严矣。’周氏所谓‘寓规’之旨则早发于李邺嗣《杲堂文钞》卷四《〈五帝本纪〉论》：‘盖《黄帝本纪》实太史公之谏书也，当与《封禅书》并读，即可见矣。’”（见《管锥编》第一册250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13. 钱钟书认为，司马迁载笔取材之旨，亦即为后世史家立则发凡。“‘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轶事时见于他说，余择其言尤雅者。’按《封禅书》：‘其语不经见，缙绅者不道’；《大宛列传》：‘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此三则足征马迁载笔取材之旨，亦即为后世史家立则发凡”。“吾国之有史学，殆肇端于马迁欤。《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皆哲人之明理，用心异乎史家之征事。屈原《天问》取古来‘传道’即马迁‘不敢言’之‘轶事’、‘怪物’，条诘而件询之，剧类小儿听说故事，追根穷底，有如李贽《焚书·童心说》所谓‘至文出于童心’，乃出于好奇认真，非同汰虚课实”。“马迁奋笔，乃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特书大号，言：前载之不可尽信，传闻之必须裁择，似史而非之‘轶事’俗说应沟而外之于史，‘野人，虽为‘常语’，而‘缙绅’未许易‘言’。孟子开宗，至马迁而明义焉。其曰‘不敢言’者，小心也，亦谦词也，实则大胆而敢于不言、置之不论尔。是以刘知几《史通·采撰》目马迁所采‘皆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李因笃《受祺堂文集》卷一《策》之六《史法》赞《史记》不‘好奇轻信’。即就《五帝本纪》记黄帝事论之。《封禅书》：‘或曰黄

帝得土德，黄龙地蚓见，；《本纪》只曰：‘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封禅书》：申公曰：‘黄帝且战且学仙，……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本纪》只曰：‘黄帝崩，葬桥山’；李邺嗣《〈五帝本纪〉论》言《本纪》于《封禅书》所述荒诞事‘尽削不载’，是也。’”（见《管锥编》第一册251～252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14. 陈可青认为，司马迁作《黄帝纪》是信而有据的。“《五帝本纪》基本的史文采自《五帝德》、《帝系》、《尧典》、《舜典》，又从《左传》、《国语》、《世本》、《孟子》、《战国策》等书摭取了若干重要的材料，旁及《礼记》、《韩非子》、《尸子》、《庄子》、《吕氏春秋》及谍谱之类的记载。五个帝纪的详略各不相同，其中颛顼、帝喾最简，且完全录自《五帝德》、《帝系》，并未润色加工。黄帝、尧、舜事迹较详，作者作了较大的整理纂次，是作者用意所在。《五帝德》据传是孔子对宰我提问的答语，其中谈黄帝部分，全文不满二百字，事迹断落凋零，互不连贯，更谈不上是一篇传记。司马迁旁征博引，扩展为四百八十多字，从内容上说，在《五帝德》的基础上，增加了黄帝代神农，灭蚩尤，黄帝统辖的疆域，政治措施，黄帝的后裔，直到‘黄帝死，葬桥山’等，形成了大致有系统的帝纪。《黄帝纪》中某些材料的来源，现在已很难找到，但司马迁作史，却是信哉有据的。”（见《北京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读〈五帝本纪〉札记》）

15. 陈可青认为，司马迁以黄帝发端，说明他有很高的见识。“在我国远古的历史传说中，黄帝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似乎许多文明都从黄帝开其端序。《礼记》说‘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易》经上说‘黄帝垂裳而天下治’，司马迁虽然没有把这些话写进本篇，而《自序》中的《五帝本纪》提要则说‘维昔黄帝，法则天地’，概括了黄帝正名百物，垂衣裳，而治天下的意思。显然，在司马迁看来，黄帝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司马迁根据《大戴礼》一书中《五帝德》、《帝系》两篇文字记载，又参照了《春秋左氏传》、《国语》等书，对黄帝这个人物进行了审慎的考察，又以亲身游历中得自民间的传说相印证，认为关于黄帝的记载和传闻，大致可靠，于是冲破汉儒们的偏见，（当时文人大多不信《五帝德》、《帝系》的文字记载）以黄帝作为《史记》一节的开端。这一切，说明司马迁有着很高的见识。”（见《北京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读〈五帝本纪〉札记》）

16. 赵光勇、许允贤认为《史记》将黄帝置于篇首，当有其特殊用意。司马迁在《五帝本纪赞》中指出，这种安排，“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道也”。“司马迁写《史记》从黄帝开端，不仅与乃父体例不同，亦与六艺有所区别，父谈作史，原拟起自陶唐，这是六艺之一的《尚书》所制定的程式，司马迁却突破了这个界限，上推至黄帝。”“《史记》为信史，自然不愿把未曾考信的神话人物当作正史的开端，只有到了黄帝，才算进入了文明之域”。“司马迁将黄帝作为大统一的缔造者置于《史记》的首篇而加以赞美。”“在我国的历史上，只有黄帝是第一个统一天下的英雄。从此以后，我国历史才揭开以天子为中心的大一统的新篇章，司马迁也用此丰富和完善了孔子的学说”。“司马迁不仅把黄帝尊为历代帝王之祖，而且为民族的大融合提供理论根据。”“自司马迁把我国不同地域的民族都视作黄帝的后裔载入史册，黄帝就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始祖，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至今仍为团结和统一的象征，深深地根植于千百万人的心中，其价值无论怎样评估都不会过分。”“《史记》以黄帝为开端，也是为世代帝王树立了一个楷模”。“司马迁笔下的黄帝，则是威恩并用，实行‘修德振兵’两种办法，‘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年者去之’；绝不姑息，否则，就不会有大一统的局面，社会也得不到安定，生产更得不到发展”。“司马迁在《五帝记》中，是把黄帝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记叙的，既娶妻，又生子，一个‘黄帝崩，葬桥山’就横扫了有关黄帝成仙登天的一切迷信，与《封禅书》对武帝的愚蠢言行的揭露，异曲同工，相得益彰。正如《史记评林》引柯维骐的话说：‘按诸史所载，谓黄帝采铜铸鼎，鼎成帝崩。夫谓鼎成骑龙升天，盖本方士之说。……太史公纪之《封禅书》，以见汉武之惑，此云崩且葬，所以祛后世之疑也。’所以，司马迁匠心独运，对黄帝纪有着深刻的用意。”（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增刊《〈史记·黄帝纪〉深意探索》）

17. 周先民认为，《五帝本纪》五位一体的结构决定了我们必须用合五为一的眼光去理解五帝的形象特征，他们是尽善尽美的理想帝王的典型代表。主要特征如下：有卓越的资质；有无私奉献的品德；有以民为本的意识；有创造革新的精神。（见《文学遗产》1995年第3期《尽善尽美的理想帝王——读〈史记·五帝本纪〉》）

18. 郭维森认为，《史记·五帝本纪》确立了黄帝为五帝三王的始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史上各族融合、统一的过程中，往往都归属到炎、黄这面旗帜之下。如春秋时戎子驹支称诸戎是四岳之裔胄，越族则被认为是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南蛮关于始祖盘瓠的一段神话，也和高辛氏产生了联系。楚族本自称蛮夷，但到战国时，便自称是颛顼之后裔。汉代的匈奴，也有“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的说法，北朝的拓跋魏是鲜卑族，关于其祖先的来历也有这样的传说：“黄

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可见炎、黄取得中华始祖的地位，是在《史记》的基础上经过民族长期融合的过程，自然形成的。如今，海内外的中华儿女都承认是炎黄子孙。炎黄已成为祖国、民族的代称，这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发民族自信心具有十分巨大的作用。（见《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读<史记·五帝本纪>札记》）

19. 孙赐芳认为，《五帝本纪》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首篇。其价值主要在于为中国早期历史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以及早期国家形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五帝本纪》中所记载材料的可信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早期历史、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以及早期国家形成研究结论的科学性。本文主要从文献学角度，辅以相关的历史资料和近年的考古资料，从四个方面对其进行研究，以论证其可信性：一、《五帝本纪》的基本内容及材料来源：本章在介绍《五帝本纪》内容的基础上，主要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对《五帝本纪》记载与诸多先秦及其它相关文献记载进行对比研究，考证其出处，探明其渊源，证明其记载有据，当属可信。二、有关《五帝本纪》的五帝说与其他五帝说：本章主要分析各种不同的五帝说及其产生的原因，发展源流，证明《五帝本纪》之五帝说的可信性。三、《五帝本纪》所载五帝人物的真实性：本章分别就《五帝本纪》所载五帝的典型事迹进行文献、考古等方面的考据研究，论证其五帝人物的可信性，以及他们所处时代应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时期。四、《五帝本纪》与五帝谱系。（见《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史记·五帝本纪〉可信性研究》）

20. 孙锡芳认为，《五帝本纪》中的“帝王”名称实为“族名”和“人名”混淆的结果，而各帝王之间前后相乘的关系也实为氏族与氏族或者部落与部落之间的那种相继繁衍，兴盛、衰亡发展历程的一种体现，而绝非具有直接血缘关系父子相承。司马迁《五帝本纪》采纳《帝系》《世本》《五帝德》等书，将五代和三王都归于皇帝一系，是民族融合的趋势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见《云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史记·五帝本纪〉五帝谱系合理性探究》）

21. 江林昌认为，从学术史角度看，司马迁的《史记》之“五帝”、“三代”本纪在反映中国上古文明史方面，有相当的客观可靠性。这种客观可靠性是建立在司马迁继承家学与师承、熔铸先秦典籍以及注重实地考察等基础之上的。但从今天的唯物史观看，《史记》之“五帝”与“三代”本纪也存在着时代局限。这主要表现在司马迁编纂《史记》时所参用的先秦资料不全面，也表现在以儒家思想为选材

标准的片面性等方面。（见《烟台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五帝”、“三代”本纪史料价值的得失》）

0139【夏本纪】

1. 邱光庭谈到《夏本纪》时认为，司马迁约《尚书》之文而为《史记》，其于经义多不精详。按《虞书·益稷篇》：“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孔安国曰：“禹言我惩丹朱之恶如此，故辛日娶涂山氏之女，甲日复往治水，复往之后而启生焉。”“启生之后，或从东往西，或从南徂北，经过其门，闻启泣声，而不暇入子爱于启，以其水灾未去，惟大度水壬之功故也，而马迁以涂山之女聘禹之后，四日之内而生启，故闻其呱呱泣声而不入爱子，其不近人情一至于此！且禹所以此者，以己勤于治水，而不顾其家，不私其子，所以能成大功耳，若马迁之意，是禹疑其妻而惩其子，何勤劳之有焉？”（见《兼明书》卷一）

2. 高燮认为，《夏本纪》载事有详有疏。他说：“自古创业之功，莫高于大禹，而中兴之功莫盛于少康，太史公述《夏本纪》载禹治水一事独详，是也。自启以至中康，事皆从略。自中康以下凡十三帝，其中惟孔甲时载刘累豢龙一事，以外诸帝皆一事不载，夫事无可载而不载，固史裁应尔，不足为子长病。惟少康为古来间出之英君，亦有夏一代之肖子，当寒浞弑相，后缗方娠，逃归有仍，乃生少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艰苦万端，卒复旧绩。其践位也，夏筑中绝已三十九年。而《史记》载笔但曰‘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按即季抒）’，似不知有少康之事者何耶？至若帝孔甲时，天降雌雄二龙，孔甲不能食，诸说诞渺离奇，不足深信，而顾特载之则又何耶？夫少康之事例当载而不载。孔甲三事不必载而载之，此子长之疏也。”（见《吹万楼文集》卷二《书史记夏本纪后》）

4. 张大可认为，司马迁写《夏本纪》记事有材料根据，他说：“《夏本纪》系统记载夏王朝的帝系及大事，有材料根据的就多写，没有材料根据的就少写。全篇三分之二以上篇幅依据《尚书·禹贡》写禹治水和受禅，是主要的内容，关于夏史，近顾颉刚等古史辨派，怀疑《史记》的记载和大禹其人。司马迁记事实录，所写《夏本纪》是有根据的。近年来在考古工作中发现的河南“二里头文化”，经碳14测定，约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属于夏代纪年的范围。……本篇所载，夏代帝系，从禹至桀传十四代，十七王。”（见《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0140【殷本纪】

1. 黄震认为，《殷纪》亦依仿《书》为之。他说：“《殷纪》亦依仿《书》为

之，具载兴衰相乘者数四，未尝不本于贤者之用舍。而载纣取亡之事尤详，真可为万世戒。惟《汤诰》与《书》本文无一语类及。盘庚诰民三篇谓为小辛世殷百姓思盘庚而后作，难考耳。”（见《黄氏日钞》卷四十六《史记》）

2. 郝敬认为《殷本纪》独详豢龙有其用意。他说：“孔甲好鬼而淫乱，无足称者。《本纪》于诸帝中独详其豢龙一事，以为刘累赐姓本末。缘刘累为汉姓所出，而氏本豢龙，故刘媪感龙生季，犹龙云尔。夫龙不可豢，豢龙而即氏御龙，犹吞薏而姓姒，吞鸟卵而姓子，皆悠谬之谈也。史迁好奇，不详事理有无，多此类。”（见《史汉愚按》卷一）

3. 聂玉海认为，“《殷本纪》说：‘武丁修政行道，天下咸欢，殷道复兴’，这句话是谎言”。“旧史对武丁皆是赞美颂扬之词，这是由其书作者的阶级立场决定的。……以殷墟科学发掘所得之资料及卜辞中有关内容，对‘武丁修政行道，天下咸欢’予以辨正。……以武丁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生前驱使大批奴隶，任其奴役和残酷剥削压榨。而且还用许许多多的奴隶、战俘作祭祀的‘牺牲’，供他们祖先驱使或讨好神灵。死后还用人殉葬，作为祭品人牲的累累白骨、斑斑刀痕是奴隶们对武丁的‘政’和‘德’的血泪控诉。有关武丁时期祭祀卜辞字里行间浸满了奴隶们的鲜血，这是武丁野蛮残暴的罪证，血腥屠杀奴隶的场所——商王室的祭祀场，完全拆穿了武丁时的‘天下咸欢’的谎言，这一切却彻底揭露了以武丁为头子的奴隶主贵族阶级极端野蛮残忍凶恶的本性。”（见《殷都学刊》1985年第1期《〈史记·殷本纪〉一条史料的辨正》）

4. 易平认为，日本高山寺所藏裴注《殷本纪》的文本情况较为复杂。本文考证：此卷钞写于五代时期，而钞者所据底本则是初唐以前的《史记》夹注本，它具有早期《史记》夹注本与五代钞本的双重特征。考察高山寺本《殷本纪》文本源流，发现唐、宋两个关键性的《史记》传本——司马贞《索隐》所据本和北宋景祐本与高山寺本既是一脉相承，又有所变易。高山寺本《殷本纪》不仅为《史记》校勘提供了宝贵的古本资料，而且为我们了解宋人校《史》的某些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见《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日本高山寺藏裴注〈史记·殷本纪〉文本源流考》）

0141【周本纪】

1. 欧阳修认为，《周本纪》有不可信处。他说：“昔者孔子当衰周之际，患众

说纷纭以惑乱当世，于是退而修六经，以为后世法，及孔子既没，去圣稍远，而众说复兴，与六经相乱，自汉以来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经，则《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尔，复何疑哉？司马迁作《周本纪》，虽曰武王即位九年祭于文王之墓，然后治兵于孟津。至作《伯夷列传》，则又载父死不葬之说。皆不可为信，是以吾无取焉，取信于《书》可矣。”（见《欧阳文忠全集》卷十八《帝王世次图序》）

2. 王若虚认为，《周本纪》谈《多士》、《无逸》同《鲁世家》有矛盾。他说：“《周本纪》云‘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逸》’。《鲁世家》云‘周公恐成王有所淫逸，乃作《多士》、《无逸》’。自今考之，《多士》为殷民而作者也，《无逸》为成王而作者也；在《本纪》则并《无逸》为告殷民，在《世家》则并《多士》为戒成王，混淆差互，一至于此！盖不惟抵牾于经而自相矛盾亦甚矣。至《世家》杂举二篇之旨，支离错乱，不成文理。读之可以发笑。”（见《滹南遗老集》卷九《史记辨惑》）

3. 方孝孺认为，《周本纪》载武王斩纣王首一事乃采薄夫妄言。他说：“司马迁之为《史记》，其志以作《春秋》自拟，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于记载往昔之事，奇闻怪说，无所不录，而于三代之本纪，多背经而信传，好立异而诬圣人。其他微者无足论，若武王与纣之事，见于《书》最详，而迁乖乱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圣人之不幸也。……迁乃谓武王至纣死所三射之，躬斩其首，悬于太白之旗，又斩其二嬖妾，悬于小白之旗，此皆战国薄夫之妄言。齐东野人之语，非武王之事。迁信而采之，谬也！”（见《逊志斋集》卷四《武王讨纣》）

4. 凌约言云：“太史公叙事，每一人一事，自成一片境界，自用一等文法，观此叙褒姒一段可见。又曰‘布币而策告之’，‘棱而去之’，‘莫敢发之’，‘发而观之’，‘裸而噪之’，‘既龀而遭之’，‘惧而弃之’，‘执而戮之’，‘哀而收之’，‘见而爱之’，此文法之一也，后可以例观矣。”（见《史记评林》卷四引）

5. 陈仁锡认为，《周纪》表现了司马迁的超卓处。他说：“为善是圣人性内事，若显为善，则开积善累德之谗，故‘阴行善’三字，太史公写出至圣一段明夷艰贞苦心处，不是后来阴谋。周事独详，以《周书》之多有故。《周纪》文有三体：幽王以前多采《国语》，其文奥；平王以后多采《春秋》，其文简；威烈王以后多采《战国策》，其文肆。”（见《陈评史记》卷四）

6. 牛运震认为，司马迁有失于考据之处。他说：“宣王中兴事业，如敬天变，

安流亡，任将帅，简车徒，平淮夷，攘戎狄诸大事，载于二《雅》及他书者甚多，《史记》一切略之，而摭采《国语》，列叙其料民太原，不藉千亩一切失德之事，略美详恶，亦似失宜。《史记》载赧王时东西周分治，西周称曰武公，而东周不载其名号，其言西周君者，亦未知其是否武公，其但言周君者，亦先明文定其东西，至于世系年代，益属茫如，或书传残阙无可载录邪，抑太史公失于考据邪！”（见《读史纠谬》第一《史记·周本纪》）

7. 吴汝纶认为《周本纪》体势闳远。他说：“周事兴于仁义，亡于积弱，自成康以前叙其盛，由积善累仁；自幽厉以后叙其衰，即以政由方伯，摄起强侯行政，以为卒亡于秦作势。上下八百年始末，具于一篇之中，体势闳远。”（见《桐城先生点勘史记》卷一《周本纪》）

8. 夏炯认为，《周本纪》记事有矛盾。他说：“《史记·周本纪》于威烈王二十三年书命韩、魏、赵为诸侯，定王十六年书三晋灭智伯，显王二十六年书王致伯于秦，四十四年书秦惠王称王，皆一书再书以见笔削之意，独于田齐无文，惟敬王三十九年书齐田常弑其君简公而已。按温公《通鉴》安王十三年田和会魏文侯，楚人卫人于浊泽求为诸侯，文侯为之请于王，王许之，《本纪》于此既脱而不书，而于显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称王后书云，其后诸侯皆为王。《索隐》以为指韩、魏、齐、赵，则所谓齐称王者，未知指姜齐乎！指田齐乎？其前后矛盾如此。”（见《夏仲子集》卷五《读史记·周本纪》）

0142【秦本纪】

1. 司马光认为，《秦本纪》中载由余语穆公一事有差。他说：“戎王使由余于秦，秦穆公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仅以小治。及其后世，阻法度之威，以督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末戎狄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此真圣人之治也。’穆公以为贤，乃离间戎之君臣，卒由余而用之，遂霸西戎。所贵乎有贤者为其能治人国家也，治人国家，舍诗书礼乐法度无由也。今由余曰：是六者，中国之所以乱也，不如我戎夷无此六者为善，如此而穆公以为贤而用之，则虽亡国无难矣，若之何其能霸哉？是特老庄之徒设为此言，以诋先王之法，太史公遂以为实而载之，过矣。”（见《司马文正公传家集》第七三《史剡》）

2. 牛运震认为，司马迁写《周本纪》有深意。他说：“按《索隐》云，秦本西戎附庸之君，不宜与五帝三王同称本纪，可降为秦世家，刘知几《史通》亦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